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

目 录

- 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
..... 孙 波 (1)
- 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的经过
..... 安恩溥 (19)
- 第二路军对红一方面军追堵的回忆
..... 高蕴华 (48)
- 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龙云的措施
..... 萧本元 (53)
- 防守普渡河的回忆
..... 卢浚泉 (56)
- 滇军两次堵击红军的情况
..... 常绍群 王伯勤 (58)
- 阻击红军长征概述
..... 刘国举 (67)
- 滇军在云南地区追截红军北上的概况
..... 王光伦 (70)

昆明抗拒红军长征事略

.....李世荣 (78)

一九三五年云南地方武装概况及

参加阻截尾追红军的概略

.....云南省滇参事室 (80)

蒋介石在滇追堵红军的部署

.....晏道刚 (89)

薛岳部追堵红军入云南和川康

.....魏益贤 (99)

湘军纵队尾追红军入滇经过

.....李 觉 (103)

红军长征过楚雄

.....毕希德 (106)

龙云指挥滇军参加追堵红军的经过

.....李 明 何玉菲 (109)

关于云南的经济财政金融和工商业概况

.....缪云台 (127)

王兴斋在清末经营的南帮票号

同庆丰天顺祥简史

..... 陈鹤峰 (142)

我的经商道路

..... 庄启发 (180)

滇西边境的重要贸易 玉石业

..... 张竹邨 (190)

云南伊斯兰教概略

..... 纳忠伦 (212)

景颇族中的基督教

..... 刘扬武 (230)

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

孙 渡

一、滇军出境防堵的决策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附近时，蒋介石即电令云南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龙云为研讨对策，曾先后召集了好几次会议，出席的有云南省政府的部分委员，第十路总部的部分处长和其他有关的人员。

在会议中，有些人认为红军不会到云南，其理由是云南地处边隅，无回旋余地，容易被消灭，并举出石达开当年为什么不到云南，和广西红军为什么不在广西而要远赴江西，以为例证。因此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以保境安民为好。这种主张，以省政府马聪及总部军务处长陶汝滨为代表。

总部经理处长孔繁耀说：万一红军进入云南，则“地方”秩序必大遭破坏，“公私必大受损失”，为策万全计，与其拒之于境内，不如拒之境外，并且也合“中央”意图。

昆明军分校主任唐继镛说：红军善于化整为零，若分成多股纵队，从正面向本省前进，殊不易防堵；应分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早作坚壁清野之计，将一切重要物资运存于附近坚固的城市或碉堡中，由各县常备团队守备。这样，红军到达，必无所获，自易退散。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红军只有少数力量，在大军跟踪紧追、各省军队到处堵截的情况之下，“实无幸存之理”。省政府委员周钟岳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断言红军“已临末日”，并举由秦汉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时代的农民起义（一概说成是“流寇”），来与红军相类比。他还为红军算命，说太平天国尚有十三年的命运，红军的命运比太平天国还短。龙云也断言红军“必同石达开一样到大渡河而败亡”。

我当时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我向龙云建议说：“蒋介石这次追堵共军，实怀有一箭双雕的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顺便消灭地方武装。因此，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使他以后无所借口。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此表示同意，并即以我为第十路总指挥行营主任，负指挥全责。

二、龙云的围黔和薛岳、王家烈间的暗斗

龙云素有吞并贵州之心，正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既奉有蒋介石之命，正好顺水推舟，控制贵州。所以在部队出发前夕，龙云特邀我和旅长刘正富、安恩溥、鲁道源、龚顺璧五人在他家中晚餐。龙密嘱我们到贵州后须顺便解决王家烈部。当时我说，如王部与我驻地相近时，则很容易想办法解决，若相距太

远又驻地分散，则不易做到；如与之公开冲突，则解决其一部或将之驱逐出贵州，尚有把握。我说了后，各旅长皆缄默不言。龙就说：“我所说的是一个大体的方针。你们到贵州后可按情况相机办理。”至于龙云所以要并吞贵州，实以云南素有视贵州为其附庸的传统心理。辛亥革命以后，滇军曾数度进占贵州，而黔军首领如袁祖铭、周西成等或被驱逐出黔，或被击毙，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马到成功。当时，龙云以为进入贵州的只有云南军队，不料后来蒋介石嫡系军尾追红军的部队已抢先进驻贵阳，以致龙的这个企图未能实现。

一九三五年一月间，中央红军已到遵义一带，云南部队也先后集中于滇黔边境的宣威，随即向贵州的威宁及毕节前进。二月间滇军到达毕节后，知红军正由川滇黔边境向云南的威信、镇雄方向进发，遂即转开镇雄。我先头部队行抵该县的大湾子及斑鸠沟两地附近时，即先后发现少数红军也在向该地前来。在双方微有接触后，滇军不敢前进，红军就毫不迟疑地回头复转黔北。此时，来到贵阳即坐着不动、企图“坐山观虎斗”的薛岳，正兴高采烈地通电宣告黔境已无共军踪迹，可是转瞬之间，红军又再度进入遵义城了。

当红军第二度来到遵义之前，王家烈及其直属部队驻防遵义。可是黔军在与红军接战时，一触即溃，王本人仓惶之中仅带着身边少数随行人员，一面放枪一面冲出城外，狼狈窜逃，一直来到黔西县城始行停下。

当红军由云南镇雄回师东进后，云南部队也随之进入贵州的毕节、大定、黔西一带布防。这时蒋介石为了指挥统一，即发表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孙渡为第三纵队指挥官。兹将第三纵队的编制录下：

第三纵队共辖云南步兵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等六个旅，两个新兵团和两个独立营。纵队指挥直轄有警卫一营，配有一百瓦特及十五瓦特电台各一台。各旅辖步兵两个团。旅部直轄特务连、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也有十五瓦特电台一台。各团辖步兵三个营，营辖步兵四个连，连辖三个排，排有轻机枪一挺。（少数团部配有重机枪）。全纵队合计共有官兵约二万四千人左右。装备武器系新自法、捷、比、三国购置，不但黔军不能相比，即蒋嫡系军的装备也赶不上。

纵队独立营以上的主官姓名是：第一旅旅长刘正富，第一团团长袁存恩，第二团团长董文英。第二旅旅长安恩溥，第三团团长郭建臣，第四团团长万保邦。第三旅旅长龙雨苍（因病故，未补缺），第五团团长萧本元，第六团团长严家训。第五旅旅长鲁道源，第九团团长冯云，第十团团长侯镇邦。第七旅旅长龚顺壁，第十三团团长杨时彦，第十四团团长马继武。第九旅旅长张冲（因任云南盐运使，未随队出发），第十七团团长王开宇，第十八团团长王炳章。新兵团（番号已记不清）团长罗廷标、龙翔；个旧独立营营长邱秉常，永绥独立营营长龙奎垣。

龙云虽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实际能够指挥的只有一个第三纵队（云南部队），而且由于不了解全盘情况，或者了解得不及时，就是指揮第三纵队的行动，也会发生与别的纵队行军重叠或者交叉，甚至逆流行军等毛病。所以，他识相一点，还是连第三纵队也不要指挥，自己干脆做一个“空头司令”好了。

至于王家烈的处境更为不妙。因为早先时候曾有该省南笼

县（现名安龙）恶霸袁某（袁祖铭的父亲）曾往南京见蒋介石，一见面就跪在他面前，诉说王家烈在贵州的罪恶，并倚老卖老地要求蒋介石撤换王家烈，否则他宁跪死不起。这就使蒋有所借口。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西南各省，如粤桂滇黔川等皆各霸一方，独行其是，贵州居于西南的腹地地位，地方武力在西南各省中又为最弱，于是蒋介石从贵州首先开刀。

据说在一九三四年底，薛岳率部尾追红军进入黔东时，王家烈曾好意地远赴重安江欢迎。可是薛岳避不见面，竟混在他的部队内，暗暗通过欢迎行列，故意不打招呼。当时薛岳所部官兵服装一样，所以王不能辨认。王等薛久无消息，始向部队询问，乃知薛早已过去了。王知薛有意作弄他，心中很不高兴。及见薛部一直开往贵阳，并不向黔北跟踪红军，王更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当黔北的红军已向云南西征，王家烈本人也进驻遵义县城以后，仍不见薛部有离开贵州的迹象，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薛部的径入贵阳，并非偶然。薛部因长途行军，拖得太久，士兵落伍者甚多，一到贵州就大补缺额。由于薛部粮饷比贵州部队优厚，以致王部士兵纷纷逃到薛部。王部为了报复，也乘机暗自派人到薛部报名补兵，拐取武器。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连续发生，更使双方的矛盾日趋表面化了。

王家烈在黔西同我会面时对我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在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搭拉着脸皮对人，好象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如果不得已时，我只有向云南跑的一条路。到那时候，恳请云南暂划几个县给我作安身之所。”王并请我将此情转达龙

云。我当时虽感到可笑，但仍安慰王说：“滇黔本是一家，休戚相关。如果需要帮忙的时候，云南当会尽力而为，请放心好了。”当时王家烈与蒋介石、龙云以及本省军阀犹国才和地方恶霸等都有矛盾。犹国才这时虽任第四纵队副指挥，但仍与龙云暗中勾结。

云南部队大多是新近才成立的，尚无实战经验，对红军作战更感生疏。到达贵州后，听说蒋嫡系军在江西实行碉堡封锁政策，我们一方面感到新奇，另一方面也断定碉堡政策必有其缺点，或者封锁有空隙，或者部队胶着于碉堡之中，而无主动出击的精神，不然红军为什么会长征到了贵州呢？

云南部队不会修筑碉堡，只能构筑一些野战工事，供必要时的依托。又因红军行动迅速，神妙莫测，恐有猝不及防的危险，我指挥部乃通令各步兵团，均须挑选行军力强并有特种技能的官兵，各编一个能分合使用的游击队，由纵队部、旅部或者团部指挥，不论行军、驻军均在主力外围一日行程之内进行游击活动，以掩护主力的安全，并搜集红军的情报。

未几，闻吴奇伟的第一纵队向遵义进犯，遭到红军猛烈的回击，几乎全军覆灭。我觉得红军的威力，并不因长途征战而稍减，乃向薛岳建议说：“专事进攻，则共军必旋磨打圈，徙移无常，以走疲我，伺机反击；专事封锁，则我又因构筑碉堡，旷日持久，徒使共军从容坐大，安然休整，不难一举而突出于封锁线之外。现在我军应利用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乘共军无根据地可供依托之际，实行外锁内攻，同时并举，围堵跟追，密切配合，庶使共军处处时时受攻，寝食不遑，动则处处被阻，障碍难行，以免共军随时居于主动，我则经常陷入被动的地位。”我当时还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的

政治（军民、派系关系等）不可能实现这主动的战略战术。

三、蒋介石到贵阳亲自指挥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贵阳，通令各军由他自己直接指挥，不得擅自进退。跟着，军用飞机也来了，部队也逐渐增加了。除了原在贵州的第二路军的四个纵队外，先后进入贵州的部队，还有廖磊、李崧珩、郝梦龄等军和郭勋祺等旅。蒋介石还电告何键准备四个师，并要王均的第三军，均候令开入贵州（后来因红军已向云南进军，何、王两部遂中止调黔），企图以压倒的优势来消灭红军。从此以后，飞机反覆对红军进行侦察和轰炸，并迟滞红军的行动。因蒋派有“督剿专员”随军行动，监督执行，并调查各军内部的情况，故对执行蒋的命令，尤不敢马虎随便。正由于不敢马虎随便，往往造成部队极端的、无谓的疲劳。因为蒋的指挥，多凭飞机报告，而飞机又每每为红军所愚弄，报告多不确实。如红军明明向北行进，听到飞机来时，即向后转朝南行进，等飞机去后，又依旧转向北进。而飞机只看到红军的南进，即电蒋报告，蒋就根据报告令各军均向南堵截或跟追，并指定到达地点，限期赶到。各军虽明知赶到后，徒然累得人困马乏，依然扑空，可是不赶又不行，因为深恐万一他所指定的地点真的来了红军，你若不按规定赶到的话，则贻误戎机之责，就不能辞其咎了。到后如无红军，则又向有红军的地方赶，天天如此，几乎成了一个照例的公式。因此，只要红军方面略施一点小小的佯动，就可调动反动派整个阵营戎马倥偬，动荡不已。如我的第三纵队原在毕节、大定、黔西之线担任防堵，由于红军的行动变化无常，以致蒋介石对我部的调动也日益频繁。他曾令三纵队向

打鼓新场急进，中途又令仍回原防，继则一直在川黔边境的古蔺、大定之间穿梭似地来往。我们时而由贵州北渡赤水河开往四川，时而又由四川南渡赤水河返回贵州，时而又在赤水河南北跨川黔两省地区布防。由于来往的频繁，连沿途经过的地方如雪山关、瓢儿井、打鸡阁等，都变成了很熟的地方。我们部队往返跋涉，拖去拖来，将近两月之久，疲于奔命，却始终未见到过一个红军。可是也幸而未碰到红军，如果真碰到了红军，则以这样疲乏不堪、锐气全消的军队，未有一触即溃的。

三月下旬，除了我的第三纵队仍跨赤水河在川黔边区古蔺、大定之间担任防堵以外，其他在贵州的反动部队，均为红军吸引到了乌江北岸的遵义地区，象飞蛾围绕着灯光一样地围绕着红军在打转。坐镇贵阳的蒋介石，留有一个师负责警备的责任，对号称天险的乌江的南岸，复派有一个团沿江扼要守备，自以为防范周密，可以高枕无忧。料不到霹雳一声，突然传来一部红军已经冲过乌江南岸的惊人消息，震动了整个贵阳。此刻贵阳仅有一个师的兵力，要兼任城防及郊区碉堡的守备颇成问题，别的部队又均隔在乌江北岸，急切调不过来。蒋介石焦急异常，乃电调第三纵队经大定、黔西、清镇兼程赶赴贵阳。当我纵队安恩溥旅到达鸭池河附近时，蒋已派有卡车多辆在该地等候，接运一部兵力先往清镇保护飞机场。又找纵队的第七旅，因该旅有一天未及赶到指定地点即行宿营时，蒋知道后，曾亲自打电话问该旅旅长龚顺璧为什么不按命令开到指定地点。所有这些，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紧张。

我这次路过黔西，又会见了王家烈。他一见我即眉飞色舞地说：“你老哥看共军这回渡过乌江南岸，究竟是什么意思

愚？”跟着，他又迫不及待地自己回答说：“我看硬是要将老帅的军哟！你说是不是”态度表现得十分高兴。当时蒋介石派在该部的“督剿专员”就在王的身旁，口里虽未说什么，但其表情显有不悦之色，难保他不将王的所言所行转报蒋介石。

我行抵清镇，蒋就派汽车前来接我到贵阳，随即会见。蒋头一句话就问我：“龙总司令有什么电报给你没有？”事后才知道龙云在当时曾有电报叫我退往安顺，适我已离部，故不知道，想系为蒋的侦察电台所侦知，故蒋才这样急于问我。跟着，蒋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有一件，就是云南部队自进入贵州境内以来，用的都是云南富滇银行发行的滇币。新滇币的币值是两元等于‘中央’币一元。我们并带有少量的云南半开银元，随军到处兑现。可是还有少数地区对滇币拒绝使用或者有意贬值。拟请委员长飭令贵州一体通用，以免发生困难。”蒋当即应允立即下令。接着问了我一些家庭状况及平素喜欢看些什么书等生活细节问题。最后，还对我说川军在土城“打得很好”说了不少称许之语。我见蒋后，在贵阳与前第四十三军的师长张廷光（贵州安顺人，当时在薛岳部任参议）相晤。张对我说：“你们到了贵阳，这里的人心才算安定，尤其是委员长对你们云南的部队印象最好。他看到你们的部队能够照他命令按期赶到，不禁高兴得以拳击桌说：‘这种军队才算得是真正的军队。’”我也笑向张说：“我见过委员长，他甚赞川军打得不错，现在你又说他极道我们滇军之好，我觉得这种间接的鼓舞办法，比之直接嘉奖还要高明得多。”

蒋介石在接见我以后，又传见了第三纵队先后抵达贵阳的第二旅旅长安恩溥、第七旅旅长龚顺璧、第五旅旅长鲁道源

等，各有慰勉，并发给纵队部两万元，到贵阳的各旅各一万元的补助费。到此为止，所谓赶赴贵阳的任务，就算告一段落。

四、阻截红军成了送行

当我在贵阳再度与蒋介石见面时，蒋对我说：“现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军已转到清水江附近一带，并在清水江上架有浮桥两座，队伍正在纷纷过江，向东前进，似有向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回转模样。第三纵队应先开赴黄平、施秉附近防堵，如该处无共军到达，应继续赶至镇远附近迎头阻击。”我当即照蒋所示，转令各旅即日开拔。我因在贵阳与各方接头，有所耽延，乃向前敌总指挥部要了一辆汽车，前往追赶队伍。不料车开到离贵阳才三十余里的谷脚附近，忽觉汽车有被沙石打击的响声，我回头一看，发现路的左侧（北方）山上有百数十人的队伍，一齐开枪向我的汽车射击，我当即告诉司机仍然向前行驶，不能稍停。行约数里后，又遇有扮作田中耕耘的便衣人员五、六名转到汽车路上向汽车射击，并将汽车前轮击坏。我命司机不顾一切向前直冲，终于冲出火网之外，查点车上卫士，已伤三死一。我因车已被击坏，乃率其余数名卫士下车步行，令司机将伤亡人员运往龙里，并手令已抵龙里的第七旅即派兵一团沿公路前来，候令派遣。该旅接到命令后，即派第十八团团团长王炳章率领该团前来，同我在观音山相遇。我即将在谷脚附近发生的情况告知王炳章，并令该团沿公路向谷脚前进，接护纵队指挥部到龙里。我对王说：“纵队部虽有警卫一营，但因押解款项较多（带有各部几个月的经费），一旦有事，恐难兼顾，才特派你们这一团前往接护。万一纵队部还未通过谷脚时，可告参谋长仍率部返贵阳，较为安全。你们沿途

须注意警戒，不可大意。”吩咐后，我仍继续向龙里前进，到达时已近黄昏，并询知安旅已抵贵定的瓮城桥一带宿营，该方并无特殊情况。

入夜后，龚旅接第五旅旅长鲁道源来电询问我是否抵达龙里。第五旅在纵队最后行进，是日该旅通过图云关后，即由左边分路往北向虎场前进。旅长鲁道源曾搭我车由贵阳至图云关，但由图云关下车不久，即听到公路方面有稠密的枪声，恐我有失，故来电询。鲁道源还报告说该旅及纵队部警卫营已在途中与红军接触。又据第十八团团长王炳章报告，亦云途中遇有大部红军由北向南通过，已与该团发生战斗，通往谷脚的公路已被遮断，原任务已不能继续执行云云。至此，我才判明在谷脚附近射击我汽车的部队，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而已。

次日，鲁旅及王团仍继续与红军保持接触，龚旅派往龙里西北进行武力搜索的第十四团及各游击队，亦发现红军的许多部队及驮马行李等正络绎不绝地向南行进。惟该团队等因寡不敌众，不敢接近，只远距离地向之射击。至于安恩溥旅方面，则始终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根据上面这些情况判断，红军毫无向施秉、镇远方面东进迹象，而所有红军似都来到了贵阳、龙里之间的地区。这样，不但第三纵队无再向黔东前进的必要，而驻瓮城桥的安旅亦应迅速调回龙里，始能适应情况的变化。我当即令安旅开返龙里，并令纵队部即返贵阳待命。

原先，我由贵阳出发时，在思想上存在着红军大有走黄平、施秉、镇远一带的可能，很担心阻截的任务不易达成。万料不到离开贵阳才半点钟左右，就与红军遭遇并死伤身边卫士四名。而由西向东前进的整个纵队，也被自北向南前进的红军截得支离破碎，各自为战，这对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更是一个

晴天霹雳，吃惊不小。这不仅显示了红军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高度智慧和技巧，同时对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的“情况判断”也给了一记很沉重的耳光。

及至驻瓮城桥的安旅赶回龙里，红军已越过贵阳通龙里的公路线，向贵阳的西南前进了。此时，第三纵队又奉令跟踪尾追，于是即经定番（今惠水）、长寨（今长顺）前进。我先头部队已进至紫云以西时，又奉蒋电令，谓据飞机侦察，有红军约四千人的一个纵队，正在向宗地、龙场东进中，着派兵一部向宗地、龙场跟追，我当时推测，红军不会分兵向东西两方面背道而驰地前进，或者由于北盘江渡河有阻碍，又在旋磨打圈，若以一部兵力跟追，恐有被吃掉的危险。为防万一计，乃令各旅一齐回头向宗地、龙场前进。迨返回一日行程之后，始知空军又中了佯东实西之计，将第三纵队抛在红军后方更远，而红军已安全渡过北盘江向西远去了。

当滇军行抵关岭时，蒋介石派来一个营长（原来在第三纵队第十八团当营长，到贵州后才被调去，姓名已忘，系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携有蒋的亲笔函，由贵阳乘汽车特来此地等候，迨我到达后，即行前来投交。我初颇疑又有什么紧急事件发生，及启封一看，尽是一些寒暄慰勉的话，而且篇幅竟达十余页之多，好象特地表示他在繁忙中犹念念不忘云南部队之意。这时，我还听说蒋曾电龙云，盛称我谷脚遇险仍一往直前，为“大无畏精神”的表现。蒋介石的这种行径当然不是没有意的，一则可以借此冲淡人们对他的判断错误的注意，二则还可以借此鼓励更多的人为他卖命。至于龙云方面，则认为谷脚之事，就是‘中央军’干的。薛岳听到后，曾一度向第三纵队部驻贵阳的人员解释说：“‘中央军’过去曾被红军俘去

甚多，他们当然会利用被俘士兵服装来与我们作战，使我们分辨不清，发生误会，自顾难免。但‘中央军’绝不会有穿着自己服装来自相残杀之理。”仅此一端，亦可见反动派貌合神离，互相猜疑之甚了。

红军到达黔西南后，有经兴义进入云南的模样。于是龙云令第三纵队留驻滇黔边境的第一旅，开赴兴义东北的顶效附近防堵。该旅到达顶效时，红军已由兴仁经黄泥河一带进入云南的平彝（现名富源）。尔后，该旅继续经曲靖、马龙向嵩明、武定、禄劝方面尾追红军，迨抵元谋，红军已渡过金沙江向西康长征去了。云南部队遂即停止尾追，时间约在五月中旬左右。

不久，即闻王家烈被蒋介石调职，并乘张学良到筑汉之便，叫王坐张的飞机离开贵州的消息。以后王又被送进陆大受训，这样也就解除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政大权。

五、对红二方面军的防堵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又长征到贵州。我的第三纵队复奉令由云南开到贵州威宁地区担任防堵。当时，顾祝同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的名义，来贵阳负指挥全责。先后进入贵州的部队，除了第三纵队外，有第一纵队指挥官樊嵩甫、第二纵队指挥官万耀煌、第四纵队指挥官李觉等所属各部。

第三纵队在威宁布防期间，红军曾一度对威宁作试探性的行动，似乎有能通过则通过，可进攻则进攻的模样。先是贺龙将军所部由北向南在威宁东部的蒋军设防地带前面侧敌行军通过，第三纵队正拟向之进行侧击，忽发现萧克将军所部突到威宁东北的回水塘，此际如向贺龙所部进行侧击，反有被萧克所部

先行侧击的危险。因而怀疑贺之所以侧敌行军，是意在调动威宁附近的蒋军而予以打击，第三纵队遂不敢出动。旋贺龙所部发现威宁的东南方面，有第三纵队的梯次配置部队在防堵，乃又折向后转，仍循原路返回，与萧克将军所部齐向云南的镇雄前进。当时第一、第二纵队担任尾追，第三纵队又奉令开赴云南的昭通、彝良一带布防。

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间，第三纵队正在昭通、彝良之间行军途中，忽闻向镇雄前进的红军，又回师经滇黔边境向云南的宣威进发，于是，第三纵队也不得不回头跟踪尾追。在途中我曾接萧克将军等来函一件，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我一面转报龙云，一面仍继续尾追。追至宣威北边的途中（地名已忘），左边有一条岔路，红军已由这一条岔路走了。但我到此并未尾追，只派兵一部在岔路附近警戒，以掩护后续部队的通过，主力部队仍径向宣威南进。因为我所走的这条路，可以利用会泽通宣威的电报线路，尽先搜集情报（当时云南各县尚无电话，但可利用电报局电线通话），以便酌定行动。

当行至距宣威县城约四十里附近时，据当地老百姓说，相隔三四里就有电话线。我即令通讯兵去挂电话，随即找宣威县长范捷正询问情况。范云：第一旅现正在虎头山附近与红军接触，闻尚有红军继续到达云云。我即着范迅速通知旅长刘正富，说我们部队已经到达，随即可以参加战斗。当时我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在虎头山之战斗对红军不利，因为在我军衔尾跟追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有各个击破我第一旅的余裕时间，且虎头山在我行进方向直前，距离不远，亦非红军作战有利之地点；第二种想法，认为红军毫无顾虑地在虎头山进行战斗，一定是看到第一旅在行动中有什么弱点，或其他某种有利